

## 風雨中的中國教會

### (如同雲彩的中見證人之二)

#### 一. 楔子

當戴德生正病逝時，一位年青的中國傳道人和他的太太緊握著他的手這樣說：「親愛的，尊敬的牧長，我們是你的兒女，蒙你帶領認識主，你為我們打開了一條往天堂的道路，我們也不想召你回來，但我們會步你的腳蹤，跟著你一同進天堂去！」

戴德生的確是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和內地會宣教士的委身，激勵了千千萬萬中國信徒跟著他的腳蹤。

#### 二. 三十年代大復興

中國教會在 20 及 30 年代遇到兩大問題，第一次是政治問題，一方面有日本入侵的威脅，九一八事變、八一三事變等一連串事件激發起不少中國人對日本及國民政府那種「大抵抗政策」極表不滿，教會面對這樣的國難又有何反應呢？在上一章我們提到回應困難威脅的似乎都是來自那些比較開明的自由派，福音派的教會又有何回應呢？

另一方面就是共產黨的威脅，共產黨表明是無神論，對西方傳教士及教會並沒有好感。他們以為這些都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有些傳教士甚至被共產游擊隊謀殺，面對著共產黨日益澎漲，及國民政府的敗壞，教會又採取什麼回應呢？這都是政治上帶來的挑戰。

在另一方面，教會也存在著二大陣營，一是自由派，一是福音派，傳教士有此分化，中國教會也有此分化，基本上是他們在神學立場上有很大的分別：

- ◆ 自由派不以為聖經是神的話，是信仰的絕對權威，是無誤的，他們以為聖經只是「含有神的話語」，什麼是真理，什麼不是真理，則我們應當以我們的理性為依歸，聖經的神蹟是不合理性的，也不以為這是真理。
- ◆ 福音派則以聖經為信仰與行為的權威，聖經就是神的話，而不是含有神的話，他們篤信聖經是無誤的，是絕對真確的。

然而，這時期又是中國教會的大復興。這是自發的復興運動，我們稱之為「自發性」是因為它發生在不同的地點和不同的時間，由不同人士帶領，既沒有預先或刻意為教會復興作出週詳的計劃及安排，乃靠聖靈自由運行而成事，而其影響非常深遠，不但在中國，更遠及菲律賓、印尼、星加坡、香港等華人地區，不只在 30 年代，更影響直至今日的中國教會；這顯明是神的作為，據我看來，中國教會之所以能夠在風雨中仍然成長，多少是受這次的復興運動影響的。

首先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英國傳教士魏克斯P. Wales在上海主領培靈會，不少西教士及本地信徒都有參加，結果本來只預算有三個星期聚會，結果要延長至六星期，每晚都有700多華人參加。結果有多位信徒決志全職事奉，其中包括日後影響極大的華人教會領袖計志文、趙世光、周志禹等人。又於1927年，雖然當時的政治局面混亂，社會動盪，但一些保守派教會以為這時更需要復興，以為這是最好的自強方法。1928年，卡特(E. Carter)主講兩週奮興會，每次都有超過1000人參加，反應極好。1929年，北方的東三省亦出現大規模的復興，挪威傳教士孟慕珍(Marie Monsen)，為主要領袖在大連、旅順、牛莊、瀋陽等地佈道，出席聖經班人數激增，一年內有超過2000人受洗，就是九一八事變後，這復興運動仍是興旺。東北復興傳至華北多個省分，包括山東、山西、河北、河南、江蘇、湖北，孟慕珍巡迴佈道，賴樂融Leslie Lyall形容她為「屬靈新生命運動的創始人。」

1920年代的復興運動領導人，大多來自西教士，但到了1930年代，情況有點不同了；領導這次復興運動的主要是本地的教會領袖，包括計志文、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賈玉銘、王載、王峙、陳崇桂、楊紹唐、趙世光等。他們各人有不同的風格和事奉重點，然而他們的信仰立場頗為一致，都是保守的神學立場，堅持聖經是神的話，是信仰與生活的權威，與新派教會大相徑庭，他們的信息生動有力，重視個人實際生活及道德問題，尤其強調認罪悔改，追求成聖，讀經禱告，但不大涉及政治社會，為中國教會奠定一個好的基礎。

其中以王明道、楊紹唐、及倪柝聲尤為特出，賴恩融稱他們為中國教會三巨人。他們三人與內地會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 三. 中國教會三巨人

#### A. 王明道

王明道(1900-1991)是北京人，是中國福音派的領袖。他父母都是基督徒，倫敦會會友。1900年義和團事件爆發，王明道父母往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避難，那時王夫人身孕已重，但他父親因恐懼遭殺在6月22日自盡身亡，王夫人則於7月25日生下王明道，起初起名為王永盛，到1920年他自己改名為王明道。

王明道幼年生活困苦，做成他性格倔強，但喜愛讀書。母親自小帶他到禮拜堂，並在教會學校讀書，14歲時認識主，1914年復活節受洗，1918年入讀協和大學，(燕京大學前身)的預科部，但卻未能考進大學，使他感到極為抑鬱。1919年到保定烈士園學校教書，並且決心為神做工，雖然在學校教學出色，但當他決定再次受浸(因他第一次是灑水的)，因而與學校發生衝突，最後被開除，有關這事，他後來的看法比較寬容，不覺得只有浸禮才是唯一的水禮。

到了1924年，他開始在家中開始查經聚會，並且寫一些福音小冊子，從事文字工

作，他講道極有恩賜，聚會人數也開始增加至 100 人，他也接受到別處講道，而且他的講道也越來越進步，他主張「讀書、讀事、讀人」，他的講道不用深奧的神學觀念，語言準確、貼切、樸實、流暢、生活，貼近聖經、貼近生活。

在他講道及文章中，對罪惡放膽斥責，他更猛烈抨擊自由派神學，他稱他們為不信派，他認同舊約先知耶利米，以為神把使命交付了他，要做「堅城、鐵柱、銅牆」反對任何妥協。他走遍全國講道，在不同的宗派中講道。

1927 年，他自費出版「靈食季刊」對基督教影響極大。1925 年 8 月，在杭州與劉景文小姐結婚，王太對王明道的影響極大，正如王明道說：「雖然她不是我以前理想的妻子，但卻是今日至適宜的配偶。」

1933 年，他在北京胡同建立教會，定名為基督徒會堂；到 1949 年，聚會人數已經有 700-800 人。

1937-1945 年抗日戰爭，王明道一直留守北京，排除一切時局的干擾，竭力傳道，也有出外傳道。1942 年 5 月，在日本人的推動下，北京成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王明道本著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轍，又以為合一不一定是體制之合一，而是屬靈的合一，堅決拒絕加入，10 月 10 日，王明道被傳到日本人文化局調查官武田熙問話，他一路騎著單車前往，一路唱著「基督精兵前進」的聖詩，武田熙告訴他：「華北中華基督教團在 15 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國人都希望你能出來領導。」王明道對他說：「武田先生，有兩件事我願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個人除了我自己的教會以外，絕不參加任何團體，任何組織，第二件事我所照顧的教會絕不與任何組織及團體聯合。」他跟著略述他的信仰、主張與使命。他本來以為一定會處決，誰料日本人並沒有強迫他，反而表達了對他個人的勇氣和原則表示欽佩。

1950 年 7 月 28 日，吳耀宗等 40 名基督徒領袖聯合發表了「三自宣言」，要求全國基督徒簽名，宣言稱：「中國基督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國組織，在政府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但王明道對三自運動採取沉默的抵抗，他認為吳耀宗等人是不信派。1951 年，三自運動深入展開，全國開始所謂「控訴大會」，但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教會堂」卻不參與，也沒有受任何影響，他繼續講道，聚會人數亦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與日本人鬥爭的名聲早為人知，而基督徒會堂也是正正式式的三自教會＝自養、自傳、自治，要打倒他並不容易，這一段時間政府是採取容忍和等待。

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土改、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政治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但王明道反對三自教會的態度也越來越堅決。1954 年 9 月 30 日，北京市事務處邀請在北京還沒有參加三自教會的 11 個團體 100 多人開會，政府企圖說服王明道參加，但他在會中慷慨激昂的發言「我完全不能參加三自會，因為三自會中有人連上帝也不相信，我怎能跟他們在一起呢？」他們又拒絕政府派人到他教會進行政治學習，

他堅持政教分離，這樣他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就更明顯了。

1954年10月，北京在政府推動下，揭起了一個控訴王明道的運動，控訴他與政府相違，又不參加三自革新運動，講道極端，用意不明，危害整個基督教，在日治期間獻銅給日本，又親日、媚日。在這次控訴大會中加以誣告他，但很多信徒都站起來為王明道說話，結果這控訴大會達不到目標。。

1955年8月7日，這是星期日，王明道對著坐滿了整個教會700-800信眾講主日信息，題目是：「他們就是這樣的陷害耶穌」，嚴厲責備猶大和他的同伙，當天晚上，王明道和妻子劉景文被捕，被控反革命罪，那晚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據王明道後來自述，他本身是一個軟弱、膽小的人，又是一個願意在神面前承認自己軟弱和罪惡，當他被捕下獄，在政府不住洗腦、壓迫，又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各樣心理攻勢下，他就向政府低頭，認了很多以是而非的罪，包括

- ◆ 包庇反革命。
- ◆ 離間信徒與非信徒的關係。
- ◆ 慫恿信徒與政府對立。
- ◆ 破壞三反運動。
- ◆ 破壞抗美援朝。
- ◆ 對吳耀宗作人身攻擊。
- ◆ 反對三自愛國運動。
- ◆ 破壞國家新婚姻法（他不贊成離婚）。

還有許多牽強附會，無限上綱，極之荒誕無稽。他寫了這份「立功贖罪計劃」，同意出監以後，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

王明道後來覺得自己失敗是有二個原因。一是他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一是他太自持，以為跟日本人抗爭了八年，冒死也不退讓，怎料「一支手槍就把我嚇得糊塗了。」是因為懼怕，他把黑說成白，白說成黑。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因簽了悔改書，被釋放出來，他內心感到極其痛苦，以無聲拒絕與三自教會合作，又離開基督徒會堂。1958年4月29日他夫婦二人再次被捕入獄。被捕後他又再軟弱，從申他的「悔改書」中的罪過，但這次政府不放過他，用他的話，他真的「慘遭失敗八年」。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無期徒刑，劉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決定反而叫王明道堅強起來，自此之後，他寧死在獄中，也堅持否定他的所謂「悔改」，在諸項罪狀中，他只承認「反對三自會」是事實外，其餘所有口供都是

假的、是謊言。政府要他再寫悔改書，他就寫了幾千張紙，推翻所有口供（除反三自外），而且還給劉少奇、彭德懷鳴不平。政府對他絕望，在文革期間，他受了不少苦頭。

1973年，劉景文刑期滿，但不得釋放，一直到1977年才被釋放回家，1980年1月9日，王明道在獄中22年被釋放，但他們二人從未得平反。他一直住在上海長子王天鋒住所，1984年在家中主領主日崇拜，大概有40-50人，1988年他接見了葛培理(Billy Graham)，1990年，他又接見了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長新夫婦，談及他40年來的回憶，寫成「又四十年」，成為王明道研究之珍貴資料，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在家中主日崇拜時因病離世，享年91歲，翌年4月18日劉景文也因病去世。

除了王明道夫婦二人受苦外，基督徒會堂不少領袖及跟隨王明道路線的都被壓迫，在1955年，北京醫學院協和醫院數名學生被捕，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吳德祥自殺。8月7日，與王明道同時被捕的有東大地福音堂彭宏亮，及交道口東大街基督徒聚會處的王鎮等20多人，9月14日，在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的林獻羔、王國顯及張耀生亦被指為王明道黨集團而被捕，政府亦不住對基督教會堂施加壓力，最後有407人轉變，在楊潤民的帶領下加入三自。

## B. 倪柝聲

在上一節，我們討論過王明道，他是站一個強烈反對三自教會組織的代表人物，亦是先後被捕及被判無期徒刑，他雖然已經離開人世，但一直都未得中共當局平反，這一節我們要討論倪柝聲及地方教會面對新中國的改變的回應。

倪柝聲(Watchman Nee)生於1903年11月4日，是中國著名的教會領袖，他的影響力遠超王明道，他著作等身，很多都譯成英文，就是在西方的教會都有一定的影響力。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只有700-800人，但倪柝聲的家庭教會卻有700多間，遍佈中國，信徒達7萬人，其代表作「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已對全球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產生重要的影響。

他祖籍福建福州，是家中的長子，他父母都是美以美會福州天安堂教友，他在美以美會受嬰兒洗，就讀著名的三一書院，屬英國聖公會，接受西方教育，是個名列前茅的優等生。17歲那年，中國女佈道家余慈度來到福州傳道，他母親接受了福音，行為有極大的改變，放棄打麻雀的嗜好，而且主動為自己曾向家人發脾氣而認罪悔改，年輕的倪柝聲深受感動，自己亦去聽余慈度講道，又接受福音，願意終身奉獻，並且取了新的名字倪柝聲（原名倪述祖）。

以後幾年間，他一面刻苦讀聖經，一方面又求教於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Margaret Barker)。事實上，和受恩是影響倪柝聲至大的前輩，她將弟兄會的著作介紹給他，又嚴格訓練他。1930年底，和受恩去世，年63歲，她死時身無別物，僅遺聖經一

本給倪柝聲，裏面有一句話，「為己我無所求，為主我求一切(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倪柝聲形容她是「一位發光的基督徒。」

1922年，19歲的倪柝聲與24歲的海軍軍官王載，在王載住所開始第一次擘餅聚會，只有3人參加，即王載兩夫婦及倪柝聲。不久，王峙、王連俊、陸忠信等相繼加入，他們熱切傳福音，人也漸多，聽道的達幾百人，於是他們租用十二間排房屋聚會，初期起名為基督徒會堂。倪柝聲認為不少基督教傳統不合聖經，他以為聖經的教導是一地一教會，又反對按立牧師，所以在1924年，當王載去上海接受宣道會守真堂的美國傳教士伍柏萊的按立為牧師，倪柝聲堅決反對，王載便離開基督徒會堂。

1926年，他患了嚴重的肺病，到南京養病，後遷到無錫，專心著述「屬靈人」。同年，他往上海，並開始福音書房，得到兩位女同工汪佩真及李淵如的幫忙，興起了上海的地方教會，並且有俞成華為上海教會的長老。其後並到處設立地方教會，包括溫州、杭州、廣州、香港、重慶、桂林、昆明等。

1942年，上海教會有不少信徒覺得倪柝聲經營中國生化藥廠不夠屬靈，而且做了不少違背良心的事，這引起他們不滿，他的得力助手李淵如也退出事奉，隱居蘇州，於是上海的長老們（張愚之、俞成華、唐守臨、江守道等）把他革除出上海教會，他亦尊重上海教會之決定，停止一切事奉，也沒有參加擘餅聚會，甚至他在重慶期間，也拒絕出來講道，直至1946-1947年，抗戰結束，俞成華、汪佩真邀請他到上海與南京講道，兩地教會得到復興，1947-48年李常受、汪佩真一同探訪倪柝聲，並邀請他出來事奉，他並奉獻了在福州的二個房地，作為教會，一是福州教會，一是執事之家，在1947-1949年間，他帶領各教會，帶來空前的大復興，中國大陸約有7000地方教會，信徒超過7萬，其中4萬是在浙江。

當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不少教會領袖都憂慮中國共產黨，因其無神論的立場會逼迫宗教，倪柝聲面對這新政權，他定下有二個不同的立場，一是「頂上去」，一是「埋下來」，謂「頂上去」是對新政權採取不合作抵抗立場；而「埋下來」則是把教會化整為零，分散在信徒家中，另一方面又埋在各種職業裏，就好像日治時期的情形；正如他講過一個比喻，就好像一隻杯，摔在地上碎了，成為小片，你就無法再摔碎這些小片了！然而，他終於採取另一路線，就是在共產黨容許的生存空間中發展。

不過倪柝聲的立場是搖擺不定，原因有下列因素：

- ◆ 曾有不少共產黨員與倪接觸，給他一個印象，在新中國的領道下，教會是有生存的空間。其中倪柝聲的太太張品蕙的十六叔是中共黨員，曾多次與倪談話，更保證他在上海不會遭遇麻煩；也可以與中共周旋。
- ◆ 中共在初期也表現出溫和政策，容許教會存在，在共同綱領上更白紙黑字列明

「中國是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共產黨軍紀不錯，又照顧窮人。

- ◆ 然而，他一如其他信徒，對共產黨也有疑問，正如李常受說：「國民黨不管怎樣壞，為福音看門，共產黨不管怎樣好，但卻是反對福音。」他始終也存著對中共不信任的陰影。
- ◆ 還有，他有從聖經來的信念。一方面他認同「在某種政治與我們信仰不合時，我們只能逃走」，逃在聖經中並不是羞恥的，耶穌亦有逃，他的理論是：個別信徒可以離開中國，但教會卻不能撤退，必須在新社會下生存，最多是為主殉道，他更強調，基督徒殉道，是「能跑而甘願為主的名不逃跑，他指出在1929-1940年間，蘇聯有130萬基督徒被殺，能為主殉道，是莫大的榮耀。」

現在雖是危機，但也是大好機會，他在上海說：「沒有一個時候傳福音，像現在這麼容易。」正因如此，1947-1950也是中國教會大復興時期；他所主張的「以福音消滅革命」的口號，這亦是成為他日後被打壓的藉口。

1950年，他再次來到香港，有不少人勸他留在香港，但他決定返回上海，因為他以為大陸這麼多教會，他必須要回去照顧他們，為主作見證。他之所以有此決定，除了他對神的信心外，還有他對形勢一個錯誤的判斷，他以為教會在新中國仍有生存空間，再加上1949年9月共同綱領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宗教的自由權」，這對倪柝聲來說，無疑是打了一枝強心針。但隨著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吳耀宗等教會人士，指示其推行教會革新運動，表示出國家並不只是消極地容讓教會生存，而是積極的參與，並且有其基本政策，形勢就顯得複雜得多了！

在未談及倪柝聲與三自教會的關係前，我們要留意在1950年下半年所發生的兩件重要事件，一是吳耀宗在周恩來指示下，發表的「三自宣言」，另一件則是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抗美援朝的保衛國家行動。

吳耀宗等四十人，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發表了三自宣言。但我們可以肯定倪柝聲一定有接到這宣言，並要求簽名參加。顯然，他最初是拒絕參加，他在1950年9月，寫了「我們的立場」及「對三自革新宣言」兩篇文章，囑咐會眾採取「不聽、不信、不傳」態度，因為他不贊成宣言的內容，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掛勾。

況且，他們以為中共主要是針對有西差會背景的教會，而教會聚會所是本色教會，所以俞成華、朱忠臣、唐守臨等上海長老聯名向登記處聲明：「本教會一向是自治、自養、自傳，與外國差會沒有關係。而且他們一向主張一地一教會，是絕對本色化。所以他們既不贊同王明道等的「屬靈合一」看法；又不大願意完全加入三自組織。」

到了1950年7月，他開始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據他在一次同工談話中，他明確表示這是神給他們一個機會，就是把所有屬靈派（基要派）的教會合一在地方教會的旗幟下，在這個大的教會中，一方面他們堅持基要派的信仰，向信徒宣告他們的信仰也正是地方教會一向信仰，一方面又向政府表明他們是愛國的、三自的、沒有帝

國主義的毒素，他以為這樣教會既可以加倍的擴大，是神給予他們的機會，不可錯過；又可以在新中國的境況下生存，於是他就帶領著地方教會朝著這方向走。一方面他先後與楊紹唐、姜蒙光等保守派人士接觸，拉攏他們加入聚會處，又與內地會交往，內地會同意把位於上海新開路的總部藏書送給聚會處，而個別地區的內地會亦參加了地方教會。此外，他又爭取耶穌家庭的加入，因此，在 1950 年聚會處在倪柝聲帶領下，並沒有退縮，反而更積極的擴張。

另一方面，為了向政府表明聚會處正是他們所期望的三自會模式，倪柝聲就帶領聚會「忽然愛國」，包括

- ◆ 參加大遊行支持政府，在遊行中，打著「上海教會」四個大字的橫幅參加。
- ◆ 參加南京基督徒愛國大集會，反對美帝侵略中國。
- ◆ 1951 年 3 月，參加上海宗教界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是次聚會處有 450 人參加
- ◆ 1951 年 4 月 8 日，聚會處又發動信徒 1500 人簽名，響應政府。
- ◆ 捐獻武器，發動 1500 信徒認獻了人民幣 66159000 給朝鮮戰爭。
- ◆ 1950 年底，又表示支持三自宣言；這是因為他開始或感受到政府是完全支持吳耀宗的三自教會，並且發動了三萬多信徒簽名擁護三自革命宣言，並透過上海聚會處長老唐守臨接觸吳耀宗要求把簽名印在天風上；而聚會處信徒的簽名是佔了全國所有簽名人士的 17%。
- ◆ 又邀請吳耀宗到聚會處主講「愛國的特別聚會」，有超過 1000 信徒參加；除了吳耀宗外，不少他以前以為是「現代派」的領袖也被邀請到聚會處講「愛國主義」。據刑福增的研究，當時簽名的信徒根本就不知簽名原因是什麼。顯得複雜得多了，教會之決定名的信徒根本就不知簽名原因是什麼，又有人以為他們本來是簽名要求政府保存聚會所的地權。但倪柝聲卻把這些簽名交給吳耀宗，以為是支持三自教會之用，他所有這些行動都是以高姿態出現，很明顯他是要告訴政府：他們是愛國和擁護中共的，他以為如此作便可以在這空間生存！

倪柝聲了解到中國重視「群眾運動」，他於是便決定用「群眾運動方式」，在簽名的運動上顯示自己的群眾實力，爭取到更大的發言權。

他的策略是否奏效呢？他萬萬想不到他這樣作卻招來殺身之禍，因為他錯誤估計，帶來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首先，他錯誤估計聚會所信徒的反應，這反應在控訴大會中更顯明出來，當毛澤東推行控訴大會，宗教界也積極參與，在 1951 年 8 月至 10 月間，展開連續三個月的控訴運動，其中在上海的控訴會更是有萬人參加。控訴會主要形式是自由發言，自我動員，當時不少信徒對這種控訴會是反感的，其中聚會處一個分組負責人起來發

言，指控這類的控訴會並不是出於神，是得罪神。他還未講完，就有人奪去其麥克風，不許其繼續。又有人在控訴會質問三自負責人劉良模，問：「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去傳主的福音…政府許可不許可我們傳，傳福音是合法不合法？」往往這些控訴大會都有失控的場面，很多信徒都不願意參加，對政府來說，信徒群眾的反控訴並不是自發的表現，一切都是教會領導人（即倪柝聲）在幕後操作，而是更困難的，有一些信徒，甚至是倪柝聲的同工，在控訴會中起來控訴倪柝聲。先是福州的鄭證光和汪佩真，後在 1951 年 8 月在南京的控訴大會中，裴宏恩指倪柝聲控制著 470 多間地方教會，信徒被禁止用自己的思想，又欺騙教徒，以致倪柝聲處在一個非常危險情況。

此外，他又錯誤估計政府對他的看法，一方面政府一直不大信任他，控訴會後更指定他是幕後黑手，在此情形，他唯一的選擇，就是順著教會內反控訴浪潮，以此作為自保及反抗的手段，再加上他看到在南京控訴會中，屬靈派的楊紹唐成了被控訴的對象，又被踢出教會，他也意識到政府對他的不信任，也可以說他也不大信任政府了！

在 1951 年 12 月，倪柝聲向人民政府呈交了題為「我們的自我介紹」約五萬字的申訴文件，為自己 30 年來的歷史辯解，並控訴三自革新籌委會在領導控訴方面的偏差——是藉此用現代派打擊屬靈派，他的策略大致是這樣的：

- ◆ 堅持愛國，在政治立場上，他們是愛國，三自，沒有違背國家的要求與方向。
- ◆ 堅持信仰是不容干涉，他控訴三自教會領袖是利用「控訴大會」排除異己，以現代派打擊屬靈派，以吳耀宗為首的三自教會，其實是想用政治理由和手段來打壓屬靈派。
- ◆ 又堅持共同綱領賦予人民信仰自由，三自教會的革新正是漠視了人民的信仰自由。

然而，他又錯誤地估計當時的形勢，他低估了政府是控訴大會及三自教會的密切關係，我們可以說，倪柝聲這種站在愛國立場來反控訴三自的「合法抗爭」策略，不但未能達到目標，反而加深了政府對他的疑慮，把他視為反政府的敵人。所以，就趁著全國推行「三反」「五反」運動，把倪柝聲視為「打老虎」的對象，加以打壓。事緣在三十年代末，倪柝聲在上海開設中國生化製藥廠，抗戰期間遷到重慶，戰後遷回上海，此外，他又開設了翠華化工廠，又成立中國醫藥工業公司(Chinese Medical Industry)，雇用了一些信徒在藥廠工作。1950 年，生化廠售給國營東北化學藥廠，他則擔任東北總廠生產委員會主席，在這樁交易中，政府發覺他向政府瞞稅，被部份教會內知情者檢舉，他的經濟罪（瞞稅罪）被揭發出來。此外，由聚會處教會轄下管理的「以琳印刷所」亦引申了問題，信徒工人與教會領導亦發生衝突，而工人亦受到長老們的打壓，信徒被停止擘餅，結果，於 1952 年 4 月 10 日，

倪柝聲於上海被捕，帶回瀋陽，被控瞞稅，1953年被判盜竊國家172億元，需繳還給國家，政府又進一步指控他反革命罪行，他被判刑15年，他太太張品蕙是唯一允許探監的人，在文革中，因張品蕙不肯與丈夫離婚而遭迫害，1969年被上海公檢法軍管會稱她為反革命份子，交群眾監督改造，1971年11月7日，於上海中山醫院走廊中病逝，而倪柝聲則於1972年6月1日在獄中逝世。

### C. 楊紹唐

楊紹唐生於山西省曲沃縣楊家莊，他父母都是基督徒，自小受基督教思想熏陶，山西民風保守及強悍，於1878年，山西發生大旱災，內地會傳教士趁著賑災之同時，把福音傳至當地人民，楊紹唐父母就是當時所結的果子。

1900年，中國北方發生了義和團之亂，山西省尤為激烈，共有42位西方傳教士及其家屬以及數百位中國信徒被殺，楊紹唐父母倖免於難，楊紹唐是誕生在這個混亂的時期，清政府對內地會所損失的生命與財產作出賠償，但為內地會堅拒不受，反促英美政府退還賠款，他們並在英美中籌款，在此建立多所大學中學，醫院、推廣教育與醫療工作。

楊紹唐於內地會所創辦的學校讀書，當時的CIM傳教士何清原(Rowland Hogben)為校長，學校常利用假日，組織學生向民眾佈道，楊紹唐積極參與，為日後牧養及佈道打好基礎。高中時代，他已立志成為牧師，1923年，高中畢業後進入長老會山東滕縣所興辦的華北神學院North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研讀神學，當時適值反基督教運動，他當時也感到迷惑及徬徨，但他很快便跳出這迷惑，紮根於基督教信仰。1925年，畢業後，回到山西曲沃牧養家鄉教會，當時曲沃一帶有13間教會，他以楊家莊為中心，為傳福音不辭勞苦，他與內地會傳教士配搭，使曲沃志地區教會得以穩定發展。

非基運動後，中外教會人士極力推行自立運動，他留在山西，推行自治、自養及自傳的路線，他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又有恩賜講道，往往能深入淺出，老少婦孺都能明白，深得信徒愛戴。到了三十年代，中國教會復興之火燒到山西，先有內地會女傳士巴若蘭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由山東把復興之火帶回曲沃，接著有計志文、宋尚節的伯特利佈道團於1933年4月來山西大原等地，帶來教會的大復興。

他為了進一步發展教會，又面對教會人手短缺，他組織了靈工團，在信心與愛心上互相互勉，首先在聖經上下功夫，接受裝備與訓練，然後結隊出外到各地教會佈道、培靈及牧養教會，以提高同工的質素，於1934年在山西候馬買地建房，創立靈工團，首批學員有20人，楊紹唐親自帶領及教導他們。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楊紹唐所服事一帶地區成為抗日主要戰場，1938年，日軍入侵曲沃後，楊紹唐先後收留過中國軍隊傷兵，為漢奸告

密，當時縣長的夫人是基督徒，叫他趕快離去，他只有帶著全家逃往徧遠的薩拉齊，避難一年之久，在此期間，他開設查經班，培養工人，又與英國內地會傳教士一起幫助難民。1939年，靈工團在候馬的總部房屋盡被日軍所焚燒，靈工團也被迫解散。

此後，楊紹唐舉家遷往太原，後天津，再北平，與王明道及宋尚節有親密來往，1945年，勝利後仍留在北平。1946年應南京黃泥崗泰東神學院邀請，任教授之職。他留在蔣介石聚會的教會凱歌堂證道，他引用聖經斥責社會的黑暗與腐敗，要人悔改，求神赦免，禮拜結束後，蔣介石對他說：「我們的確有很多罪，應向神悔改。」1948年，他移居上海，任教上海江灣神學院亦任烏魯木齊路教會的牧師，每每寒暑假，經常到各地主領培靈會、佈道會，深受信徒及學生歡迎，1949年，他曾被邀請到海外牧養教會，但他堅持留在國內，1949年在南京及上海繼續牧養教會。1950年，當三自教會成立，他所領導的烏魯木齊路教會加入其中，他自己也成為全國基督教三自委員之一。他加入三自，不為王明道及其他「屬靈派」人士所認同，他的兒子在此事上有以下的看法：

- ◆ 1948年到1950年，中國環境天翻地覆的大改變，楊紹唐看到國民黨官員的腐敗，但同時他看到解放軍嚴明的紀律和進城後清廉愛民的作風，與國民黨的軍隊有著鮮明的對比，尤其在取消妓院一事，又給妓女們妥善的處置，使他對共產黨產生好感。
- ◆ 他也不怕共產黨清算，他在「靈工通訊」中寫了一篇文章，「教會的路綫」他說：「基督徒應當不怕，如果一個基督徒對世上財物不敢捨去，不但在政黨面前過不去，將來在主耶穌審判台前也過不去。」
- ◆ 他亦是一個愛國份子，在抗日期間幫助中國士兵又救濟難民，他是基於愛國之心加入三自。
- ◆ 他對國民黨的腐敗很憤怒。
- ◆ 他以為他沒有理由不順服掌權者。

但到了1952年，他被控訴，被定罪，罪行就是錯解幾節聖經

- ◆ 約翰一書二「不要愛世界」
- ◆ 歌羅西書三：1-4「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 ◆ 哥林多後書四章「不是顧念所見的」

共產黨以為這都是「帝國主義當時最毒害青年的核心內容。」他們還指控楊紹唐不拿美金的走狗，比拿美金的走狗更具迷惑力，所以在1952年被逐出南京黃泥崗教會。

他回到上海烏魯木齊路教會繼續牧養與講道，1957 年反右的時候，他又被控，因他在講道強調生命之道，被視為施放帝國主義毒素，被指控為右派，受到監管。他曾任全國三自前秘書長，但一年之後就停了，反右之後就不得登台講道。

文革開始，他又被定為反革命，交與群眾監督勞動，每天從事體力勞動，經常被批鬥，抄家及關押，身心靈受很大苦楚，但他從沒有放棄過信仰，1969 年，他被勒令出去除冰，心臟病發而死，享年 69 歲，死後葬在山西曲沃，墓碑寫上：「神的忠僕楊紹唐牧師。」他著有「神的工人」「得勝與得賞」「教會工人」和「教會路線」。

#### 四. 二十世紀偉大的殉道者王志明

王志明牧師這個名字，在中國人當中，鮮為人知；但在著名的英國威斯敏斯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西大門上方，從 1998 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之塑像，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都是二十世紀為信仰而殉道的信徒。其中一位便是中國大陸的王志明牧師。王志明與南非少女梅思默拉(Manche Masemola 1931-1928)，烏干達聖公會大主教魯溫(Janani Luwum 1922-1977)，俄國的聖伊底沙白(St. Elizabeth of Russia 1804-1918)，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得金(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波蘭神父聖國柏(St. Maximilian Kolbe 1894-1941)等先賢同受敬仰。究竟王志明是何許人也？為什麼竟受如此的尊崇呢？

##### 1. 古老而貧窮的一族

王志明是居住在雲南省的苗族人士。談到苗人，這一個顛沛流離苦難的民族，其實是中國歷史悠久的老民族之一。苗族的先祖，初散居在長江以北，黃河以南之肥沃土地上，憑藉天時與地利，是其中最早進入農耕，又發明鐵器，率先運用律法，他們其中著名的首領就是蚩尤。後為黃帝所滅，蚩尤被俘，在黎山被處死。苗族只有落荒而逃；由北走到南部，正如徐松石牧師之「粵江流域人民史」(1938 第四章「苗蠻總察」有云：「威寧苗族作為整個苗族中的一個支系，是一個受壓迫最深的部落，是一個生活尤為痛苦的部落。」

最後，他們被迫逃到雲南，貴州險惡的南地，就是在那兒，也是受到諸族的欺凌。二十世紀初年，英國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以其親受經歷，寫著說：「就地形而言，這是我在中國西部所見最為險惡之地，人們一聞此名，便不寒而栗。狹窄的道路，懸崖峭壁，路面不及一英尺寬。山崖之下，在奔騰咆哮的激流，路邊沒有任何保護之物，曾聞一戶人家，翻越滑沙坡時，一個 12 歲的男孩走在前面，不慎失足跌下懸崖，母親背著一個嬰孩，一聲恐怖的尖叫，因失去重心，也母子一同墜崖，父親見狀，喪魂落魄，也跟著跌下崖下之激流中，僅數秒之間，這一家全部命歸黃泉。他們就是居住在這樣的環境中。

地是這樣，人又是如何呢？原來苗人並不只是唯一居於此之少數民族，還有其他少數民族，如彝族，彝族就是苗族的地主，其上又有漢官，這不但是經濟的

剝削，也是政治上的迫害，他們任意「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性。」正如一個英國傳教士悲忿的寫著：「任何人想到那個無知地區的山谷中，存在著如此殘酷的行為和深重的苦難時，都會陷入極度的悲痛感慨！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悲慘的經歷，艱苦的環境，殘酷的壓迫，非人的生活，使這個忍受了數千年的民族麻木、絕望成了他們民族的特性，他們把貧窮，疾病，與死亡視為自己所無法避意識免的命運，只有在他們的無意識的底蘊中，強烈地渴望著可改變其命運的救星。

踏入十九世紀末年，內地會的傳教士首先來到這地方傳教，其中黨居仁(J. R. Adams)為首，其後陸續有傳教士來到他們當中，啟開了苗族新的一頁。

## 2. 從西方來的宣教士

1906年，內地會的兩位宣教士，從澳洲來的郭秀峰醫生(DR. Arthur Nicholls)及英國人王懷仁(George E Metcalf)從昆明騎著驢子，經過3-4天翻山越嶺，終於抵達苗人居住的村莊，剛好那年發生了瘟疫，幾乎每一家都受到影響，圓周十哩內都受感染，更因為下大雨，簡陋的房屋倒塌，那些地方人獸共住一室，衛生環境惡劣，以致傷寒疫症得以迅速蔓延，受感染的都死亡，死屍橫陳，情況嚴重，這些傳教士不顧生命危險，「明知山中有虎，仍向山中行」，冒死進入疫區。人家離開疫區，他們卻走進疫區，他們到了疫區，病的則醫，死的則葬，生的則協助他們重建家園，又教導他們衛生常識，喝清潔食水，更幫助他們除去迷信的習俗，不少苗人因著他們的見證信了主，內地會亦在撒營盤鎮(Sayingpam)建立了他們的福音基地，而同時間的循道會宣教士柏格里則在石門砍帶領苗人歸主，幫助他們建立家園，為他們創立了文字，又建立學校，成為中國第一間女子中學，及第一個考取了醫學博士的中國人。

在內地會的教會中，其中一個信徒名叫王志明，王志明生於1907年，1921年在內地會創立的學校唸書，受傳教士栽培，1926年畢業，時為19歲，畢業他任教於內地會學校，並協助傳教。在日治期間，郭秀峰等宣教士被派往另一工場，王志明便擔起教會牧養的工作。1944年並任撒營盤基督教聯會主席，在1949年時，大概有5500信徒，這正是內地會推行本色教會的政策所得的結果。此外，王志明還編譯了苗文的「頌主聖歌」，在苗族中廣為流行。

## 3. 偉大的殉道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所有外國宣教士都被逐離開中國，王志明繼續負責牧養當地教會，並且加入了三自教會。但土改期間，他拒絕批鬥當地的地主，他以為他的雙手怎可以替人洗禮，又同時流人的血，結果他自己卻因此而

被批鬥，教堂被關閉，所有聚會都受到禁止，他仍帶領會眾在山區中秘密聚會，但在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下，聚會很快便被取締，王志明亦被捕下獄。

但由於他是苗族人士中頗見盛名，政府欲以其聲望管治少數民族，乃將他釋放，並委任他為政協，1956年更以牧師身份，擔任苗族代表團的副團長，上北京參加慶典禮，獲毛澤東接見，其後他又在武定縣文化館工作，當選第一屆政協委員。

1969年，文革肆虐，王志明因反對信徒參加「三忠於」活動被捕，連同21名基督徒領袖入獄，在獄中受盡非人的虐待。1973年12月29日66歲的王志明被判死刑，在當地萬人批鬥會上被鎗決，鎗決時舌頭被刺刀絞碎。

在他臨死之前，當局批准他的一家最後與他會面，據王志明兒子說，父親臨終時，對他說：「你要好好聽「在上」(天父)的話，要保護自己的身體，多洗手，注意衛生，聽祂的話。」其實，這正是那些宣教士臨走時對王志明所講的一番話。

1980年，大陸當局為王志明平反，並且賠償了\$1300人民幣，又容許他的家人為他立碑於新墳上，1996年教會為王志明舉行追思禮拜，單是詩班便有2000人，直至今日為止，教會增長至三萬人(王志明時有5500人)，更有百多個聚會所。

## 五. 齊邦媛與張大非

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巨流河」亦是齊邦媛所寫的一本書，她說：「這本書寫的是一個未遠去的時代，關於兩代人從巨流河到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的故事」。是一本有關中國近代史悲慘的故事。

齊邦媛生於1924年，遼寧鐵嶺人，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1947年來台灣，1968年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作研究，後任中興大學及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著作很多，而這本「巨流河」一書是講述她的故事，感人肺腑，其中一段有關張大非與她之關係更令人悲慟不已。

### 1. 九一八事變

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皇姑屯站炸死了軍閥張作霖。1931年9月18日，日軍發難佔據了瀋陽，史稱之為九一八事變，自此日本人控制了所有東北省之外通訊、鐵路、公路、電訊，從瀋陽到黑龍江，他們一路受到本地的中國自衛力量反抗，一年後才全部佔領，至1934年正式成立滿州國。

雖然中國全國遊行，呼喊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誓死復土。」但喊聲沒有人理會，蔣介石一句：「日本人侵中國只是皮膚病，共產黨才是致命的心臟

病。」就致力剿共；而世界列強亦置諸不理。當時之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曾組織一個所謂「李頓調查團」，但毫無成果。

當時有不少青少年人不願當日本之奴隸，紛紛逃往天津，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一家也來到北平，後又潛回到東三省，聯絡當地的義勇軍，加以支援，但當時義勇軍無論在裝備及糧食都短缺，無法抵擋日軍；他最後只能幫助這些戰士逃回南京及天津，而齊邦媛得以在天津一間英國傳教士辦的學校讀書。

齊世英也決心開辦了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教師全是流亡北平之大學教師擔任，後遷校至南京，而所有東北中山中學的學生，都是沒有家的孩子，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淒楚的故事。

## 2. 張大非一家破人亡的故事

齊邦媛的哥哥也是就讀於中山中學，每逢星期六都帶五、六個同學到齊家渡宿一晚。其中一個名叫張大非，張大非的父親在滿州國成立之初任瀋陽縣警察局長，透過他這身份和崗位，曾接濟和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最後被日本人發覺，在廣場被燒死。

自父親被燒死後，他一家八口四散逃亡，張大非與一個弟弟、妹妹連夜逃往營口投奔姑姑，並在一間教會辦的中學唸書，每天早上都有早禱會，由「主禱文」開始；在那裏他失去了地上的父親，卻可以盡情求告天上的父親之保護和愛戴，他信奉了耶穌。

他十五歲那年，日滿州國立成，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他也輟了學，隻身逃到北平，投奔他的叔叔，他叔叔家不安全，他在極端困苦中看到國立中山中學收東北流亡學生，他就報名就讀，一切食宿免費，從此也有安身之所，而他本名叫張迺昌則改名為張大非。

張大非很靜，也不參加任何遊戲活動，齊邦媛就這樣記著：「我永遠記得起那個寒冷的晚上，我看到他用一個十八歲男子一切自尊忍住號啕，在我家溫暖的火爐前，敘述他家破人亡的故事。」她又載著：「每個星期六，我會在哥哥那群喧鬧的同學中，期待他那憂鬱溫和的笑容…有一次，他帶來他的聖經給媽媽和我看，說這是離家後唯一的依靠。當時我雖不懂，但多年後明白，為什麼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種和平、安靜。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奧待解書，很有吸引力，可他又隨身帶走了。」

又有一次，齊邦媛的哥哥及他的同學們爬山，下山時突然起風，齊邦媛走得慢，落後了，其餘的人都走了，只剩下她一人在寒風和恐懼中哭泣，這時只看到張大非在山的隘口回頭找她，原來他不放心，走回頭，再往山上攀登，把這個小妹妹牽下山，又用他的棉衣裹住她的身軀，說：「別哭，別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是這樣一個滿有愛心的男孩子。

### 3. 七七事變與血淚流離的八年抗戰

1937年7月7日爆發了蘆溝橋戰火，日本借口中國軍擄走一名日本士兵，大舉揮軍入侵中國，從此啟開了血淚流離的八年抗戰，北平天津先後淪亡，齊家從南京逃到漢口，又從漢口逃到重慶，在逃亡中，齊邦媛的妹妹病死，她母親幾乎死亡，當母親正在垂死掙扎，齊邦媛站在母親病房門口，既寒冷，孤單又驚恐，正在無援之際，看到張大非從大門進來，走進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禱，當他出來時，對齊邦媛說：「我已經報名軍校，改名叫大飛，十一點鐘在碼頭集合，臨走時一定要看媽媽，你告訴哥哥，我能寫信時立刻寫信給你們。」隨後，他拿出一個一包放在邦媛的手裡，說：「你好好保存吧，這是我要對你說的話。」然後疾步走出醫院大門。

原來他送邦媛的一本全新的聖經，在扇頁上寫著：

「邦媛妹妹，這是人類的生命，宇宙的靈魂，也更是我們基督徒靈糧的倉庫，願永生的上帝永遠地愛你，永遠地與你同在，祝福你那可愛的前途光明，使你永遠活在快樂的國裏。」阿門！

主內四哥張大非

1937年11月18日

上海守了三個月淪陷，隨之而來是南京大屠殺，死了30多萬人，而齊家也隨中山中學先逃至漢口，後轉至湘鄉，最後逃到四川，在那年代，不少學校(中學及大學)都遷徙至西北，估計有5000萬至6000萬人逃往大後方。這都是極慘痛的經歷。

有人說，現在離家一天比一天遠了，日本人佔領半個中國，如今仍在追殺不已，那一天才能回家鄉？一時之間，哭聲瀰漫，在哭聲中大家唱著那首傳唱後世的「松花江上」(張寒暉詞曲)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並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了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可愛的故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呀！

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 4. 黑暗中之明燈

抗戰逃難的情景，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不但是流離顛沛，捱飢抵餓，疾病叢生，更要捱日軍軍機瘋狂的轟炸，土匪之搶掠，能倖免死亡而抵達大後方者鮮矣。就是到了大後方，其生活困苦，又要捱日軍轟炸，真是悲慘。孫元良將軍是抗日時正規軍軍長，兵團師令，在他逝世前接受胡志偉的訪問中，回憶抗戰時逃難情景說：「我們於抗戰時，實行焦土抗戰，鼓勵撤退疏散，然而對忠義的同胞沒有作妥善的安置，對流離失所的難民沒有稍加援手，任其亂跑亂竄，自生自滅，這也許是我們在大陸失卻民心的開始吧！我從漢中長途行軍回到貴州時，發覺滿山遍野都是難民大軍—鐵路公路員工及其眷屬，流亡學生與教師、工礦職工和家眷，不願作奴隸的熱血青年…道路塞了各式各樣車輛—從手推車到汽車應有盡有，道路兩旁的農田也擠滿了人，踐踏到寸草不留，一片泥濘…難民大軍所到之處，食物馬上一空，當地人民也驚慌地加入逃難行列。入夜天寒，人們燒火取暖，一堆堆野火夾雜著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與兒童的哭聲，沿途都是倒斃和腫脹的屍體，不見一幢完整的房子，頓生人間何世之感，不由自主墮入悲痛驚愕的心境。」

十九世紀下半年，中國內地會之戴德生在中國各地傳教，在西北建立了不少教堂，而且自抗戰後，不少傳教士來到西北大後方，在大學生及中學生中服事這些流離的學生和教師們，在苦難及黑暗中提供了愛和溫暖，不少流徙至這大後方的知識份子也因此而信了主，那時的大學生團契發展迅速，在短短六年的，中國的學生團契發展為全世界最大的學生團契，影響極其深遠，而齊邦媛就在這種的情況下成為基督徒。

她到了重慶，有機會考進南開中學，在往東山的江輪上遇見了內地會陳崇桂的兒子陳仁寬，彼此成了好友，並且介紹邦媛加入珞珈團契。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舉國歡騰，但張大非卻為國殉職，在她至悲痛之時，計志文牧師從成都寫了一封信給她，說他是由珞珈團契的一位朋友處得知她的悲哀，計牧師抄了啟示錄七章最後一句作為安慰：「在主寶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計牧師不久到東山傳道，她也在衛理公會受洗成為基督徒，她在長期的思考後，以這樣嚴肅的方式，永遠記念張大非，記念他淒苦身世，記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記念他壯烈為國犧牲，學效了耶穌的榜樣。

#### 5. 一粒麥子若不在地上死了，長不出許多子粒來

張大非自入伍後，一直有寫信給邦媛，他當年只有十九歲，入伍後以優異成績，考上空軍官校十二期，並在期間曾前往沙坪壩之南開中學探望邦媛。以後他被選為第一批赴美的中國空軍飛行員，1942年返回投入戰圈，加入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

1945年5月18日，張大非在豫南會戰時，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死時只有26歲。他死前寫了一封信給邦媛的哥哥。

「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後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我寫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書，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見她由瘦小女孩長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開的操場走來，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會終於說出我愛她呢？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我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

從1938年至1944年，這七年來的書信都給邦媛保存下來，這些書信看到這年青愛國的基督徒的掙扎，他寫著：「我長年做著殺戮的工作，上帝怎樣裁判呢？但日本人殺了我的父親，摧毀了我的家，將我全國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殺至今。我每在郊區打下他們一架飛機，即可減少犧牲於炸彈下的多少冤魂。」

戰爭終於結束了。中國人民死傷千千萬萬，但張大非的死，卻啟發和激勵了無數的人。「一粒麥子若不在地上死了，就長不出許多子粒來。」

但可借八年抗戰後，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內戰，死傷無數，我們心裏不禁問：「為什麼？」

#### 六. 林昭的血書

我是從最近研讀中國近代史中看到林昭的故事。這位被稱為「北大聖女」「北大才女」的故事感人，尤其從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之記錄片中看到林昭的為人，信仰，令我熱淚滿腔，整夜難眠。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而且在今日香港的時勢，看來有着特別的意義和啟發。

## 1. 林昭的家庭

林昭原名彭令昭，中國蘇州人。有謂她生於 1932 年，亦有謂她生於 1934 年 12 月 16 日。其父親彭國彥曾留學英國，後返回中國考入國立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1926 年畢業，其論文是「愛爾蘭自由邦憲法述評」。1928 年 9 月，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得一名，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

林昭的母親許憲民的政治傾向顯然與丈夫不同。他曾任蘇州大華部總經理，支持中共，曾秘密為中共捐款，又建立地下電台。還曾在日治期間被日本人逮捕。兩夫婦的價值觀與政治理想完全不同，常為灌輸子女那一種價值觀和理想引起爭端。許憲民的哥哥更是一個熱愛中共的青年，曾任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在四一二事件中，被國民黨處決，沉屍長江。

## 2. 林昭的革命思想

林昭自小受母親的影響極大。1943 年考入蘇州萃英中學，後轉讀景海中學，萃英和景海都是教會學校。雖然她對共產黨理想嚮往，但傳教士的為人及基督教的思想亦對林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日後他信仰基督教一點也不意外。然而，她目睹國家之積弱，國民黨政府的敗壞，再加上深受大舅父及母親的影響，非常嚮往中國共產黨。中學畢業後，不顧父親反對，拒絕出洋留學，在 1949 年 7 月考進「革命搖籃」蘇南新聞專科學校，決心與家庭生不往來，死不弔孝，投身在革命去。她甚至改掉自己的「彭姓」，改姓為林。又曾經無中生有地揭發過自己的父親。多年後，林昭對此心深感不安，寫信對父親說「他們要我井裡死也好，河裡死也好，逼得我沒辦法，寫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我不得不滿足他們…我沒存心誣陷你。」

畢業後林昭隨蘇南農林工作團，參加蘇南農村土改。1952 年開始在常州文聯工作。在土改的時候，不少地主及富農被殘酷的殺害。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冰水中，凍得徹夜大叫，林昭把這稱「冷酷的痛快」，認為只有這樣的鬥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絕地主的威風。

## 3. 在北大的日子與反右運動之衝擊

### a. 在北大的日子

1954 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她立志作毛澤東時代最好的記者。林昭的文學水準極高，再加上她非常勤力，在北大瘋狂地閱讀許多她喜歡的書。同學們常看到她從圖書館抱着許多線裝書。當她視野擴闊，她開始觀察到現實並非她所想像這般美好。在大學的自由學風中，她開始成長，開始思想。更想到她和父母的關係，為到自己曾揭發父母的「罪行」，非常痛苦，哭起來。她寫信給母親時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絕不再說違心話。」

由於林昭才智過人，又勤學好思，深得游國恩教授賞識，建議她調入文學專業，但為她所拒。然而，他卻與另一個北大才女張玲任校刊編輯。1955年她又加入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最後更成為北大綜合學生文藝刊物「紅樓」之編委。被稱為「紅樓裡的林姑娘」。與她共事紅樓編委的，有樂黛雲和張元勳。這也是林昭人生一個極大的轉捩點。

#### b. 反右運動

要明白林昭的改變，我們一定要了解中國在 50 年代及 60 年初的歷史和改變。1950 年，中共初立國，無論在政治，經濟都尚未穩定，在這情況下，中共領導人致力穩定工商資產階層，又開放給那些民主派人士。朝鮮戰爭鞏固了毛澤東的地位，他又開始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來更鞏固他的領導地位。三反五反運動是針對黨內之異見分子及資產階層人仕。隨後又有土改運動，打擊地主及富農。其後是所謂大躍進，及推行人民公社制度。這些政治運動往往是非常暴力的，不少人被殺、自殺。在大躍進運動中，更促成各地紛紛謊報糧食產量。這即是所謂「放衛星」。正如毛澤東秘書李銳曾經當面問毛澤東：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會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食？」當時的浮誇現象，已經達到荒誕的地步。大躍進的結果是造成「大饑荒」。據香港大學歷史教授馮客之研究，大饑荒死的人達四千五百萬。是史無前例的悲劇。

劉少奇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為」。這已經是一個非常低調的評論了。但這句話卻導致他慘淡的收場。究其原因，是毛澤東攬個人主義，獨攬大權，排除異己，其後的「引蛇出洞」政策，跟着而來是反右運動，把毛澤東以為是對自己有威脅的知識分子及黨員一一打倒。這些行徑對像林昭及一些熱血的青年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大打擊，對國家及領導人存着極大的質疑！

在這個時候，與林昭共事於「紅樓」的張元勳，在 1957 年 5 月 19 日在北大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批評政府的腐敗，因而受到批評，被扣上帽子為右派。林昭雖然不是完全同意張元勳之看法，但對他被扣為「右派」份子大表憤怒，她更開始察覺自己有受騙的感覺。結果 1957 年張元勳及林昭都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自此她就從最紅之地位跌至最黑的深淵。他被當局視為「態度惡劣」，判勞改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1957 年，張元勳被秘密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北大當時約有 8000 學生，其中約有 1500 名師生被打成右派。他們中的許多人，被開除學籍，下放到邊疆荒野，20 多年後才得平反。

#### 4. 林昭的醒覺與信主

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併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也轉到人民大學。當時林昭的老師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她求情，得以留在人民大學，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在此期間她似乎已經對基督教信仰感到極大的興趣，在書信中常以「主曆」來表明她的改變。她與另一名右派份子甘粹談戀愛，並帶甘粹到教堂聚會。當他們申請結婚，上級不准結婚。以為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並於1959年9月把甘粹分配到新疆進行勞改。林昭咳血加劇，請假求回上海休養，並由其母親接回上海。

林昭回上海與母親相處一段時間，她更開始反省，尋求和回歸上帝。她自從1949年從蘇州景海女中畢業後，便完全脫離教會。於1951年土改時，更以「中央通告」名義警告當地教會牧師，凡行土改地區應停止一切宗教活動。但自從被打成右派，又看到中共政府的虛假，獨裁和兇殘，她開始回歸基督教的信仰，並在同學面前表明她是一個基督徒。在此期間她有機會和父親有更多的交流，她對父親始終有愧疚，但卻越來越敬仰她的母親。後來她再度被捕入獄後，父親極其傷心，服大量藥物自殺身亡。1962年，同學羊華榮見到保釋中的她，發現她頭上帶了朵小白花，問她為誰戴孝，她說是為父親。

#### 5. 再度入獄

在上海期間，林昭並沒有遺忘她對國家之憂心和承擔。當時，蘭州大學的張春文和顧雁籌辦「星火」刊物。林昭有機會和他們接觸，便在「星火」發表她的長詩「海鷗自覺」和「普羅米修斯受難之日」。對當時權派來說，這是極反動的言論。林昭在獄中給人民日報的一段話，正好說明了她的思想。

「長期以來，當然是為了更有利於維護你們的極權統治與愚民政策，也是出於嚴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雙重影響下的深刻奴性，你們把毛澤東當作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竭盡一切努力在黨內外將他加以神化，運用了一切美好辭藻的總匯和正確概念的集合，把他裝扮成獨一無二的偶像，扶植人們對他的個人迷信。」

正因如此，所有「星火」有關人等30多名，皆遭逮捕。1960年10月，林昭在蘇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父親因此而服藥自殺身亡。1962年3月，林昭得以保外就醫，返回蘇州與母親同住。她在此時結識了黃政，兩人共同起草了中國改革方案，並托人把她所寫的「我們是無罪的」和「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文章在海外發表。1962年12月，她再次被捕，在提籃橋監獄度過八年的餘生，在她文稿中有云：「我經歷了地獄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獄，我經歷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慘痛的死亡。」她又寫着：「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不論在我

絕食之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月經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過镣铐，甚至從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镣铐中暫時除掉一副。」

此外，為了阻止她大聲咒罵，當局把她的頭用巾緊緊綁着，只露出一雙眼。這是極刑中的極刑。於 1968 年 4 月 29 日，當局判處她死刑，死前她只有 70 磅。因肺病極其軟弱，當局是把她從床上拉出來秘密鎗決而死。在死前，她用血寫下「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僕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就是人心啊！

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以至對你們懷抱著人性呢？這麼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青磷光不滅，夜夜照靈臺。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  
他日紅花發，認取血痕斑。  
媿學嫣紅花，從知渲染難。

這是林昭最後的遺作——五言絕命詩。她死後數天，上海公安人員到林昭母親家，索取五分錢子彈費，真是可恥到極點！

## 6. 獄中血書

林昭在獄中，沒有筆，沒有紙。她就用自己的血在白色被單上寫作，有 20 萬字之多。1955 年 3 月 23 日，林昭開始寫「告人類」一文，。1965 年 5 月 31 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她最後血書「判決後的申明」，又寫信給「人民日報」申明。原民主法制記者陳偉斯是唯一看過林昭檔案而又願意透露其內容的人。1981 年他寫了「林昭之死」一文。不久，林的檔案就全部封存。據陳偉斯所述，檔案裡有血書。她在獄中曾用血書寫着：

「這怎麼不是血呢？陰險地利用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們的善良、單純的心，與熱烈、激昂的氣質，欲以煽動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我們的民

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己的迫害，折磨和鎮壓。怎麼不是血呢？我們的青春，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這怎麼不是血呢？」

從這些血書看來，我們實在難以置信，在幾乎不間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中，她居然能思想，而且是那麼成熟和有條理的思想。在八年的痛苦折磨中，她還能不停地在精神上索求，不住攀升。在這樣的待遇中，她不是走向仇恨，走向嗜血的誓言或咒語，而是走向對自己追求過的理想，對血腥革命的反省，走向寬恕，及對國家的哀傷。是一個充滿惻隱，憐憫和良知的有血有淚的女孩子。

何解有如此的表現？據林昭所言，這是因為她的信仰，對基督的委身所致。正如她說：「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了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上了慘重的代價…」

林昭熱愛生命，他說「我是一個凡人」。她對獄警發出最嚴厲的責問也只是：「你們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在獄中她曾一度 and 基督徒俞以勒同室，二人成為好友。這大概是她在獄中最開心的時光。她更自稱為「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

在獄中的精神折磨真不簡單。一次，經過一場慘無人道的刑訊折磨後，她用血在牆上寫道「上帝幫助我，我要被逼瘋了。」「我默默摳著牆上的血點，只有想到那麼遙遠又那麼切近的慈悲公義的上帝時，我才找到要說的話，這個滿腹委屈的孤憤的孩子無聲地禱告說，『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鬼這麼欺負人，我不管了，我甚麼都不管了。！』」在書中，她還寫了不少詩歌，日記，其中包括「基督還在世上」，可惜未有機會見過。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實踐自己的信仰，稱她為「聖女林昭」絕不為過。

#### 7. 林昭的血仍在說話

林昭死後，其母親精神失常，後因醫院拒絕醫治，1975年在上海外灘自殺。其弟彭恩華2004年逝世於美國猶他州桑迪市。其妹彭令范1985年移居美國。並且也歸信了基督。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宣佈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並定論為冤殺無辜。1981年1月25日又因她妹妹的努力，上海高級人民法院撤銷1980年判書，改判林昭並不是精神病，並且依舊宣判無罪。但林昭屍體下落不明，現今林昭之墓只有她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縷頭髮。墓碑寫着「自由無價，生命有涯，寧為玉碎，以殉中華。」至於林昭的

檔案，1980年曾一度開啟，後又再封存。現其妹彭令范捐贈了她所擁有之血書，公開信，私人信件於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但時至今天，林昭死後四十多年，中國政府仍嚴禁及阻撓拜祭林昭之墓的人仕。因她的血仍在說話！